

法家路线与我国第一部药典 ——唐《新修本草》

钟 若 岩

(中药研究所)

THE LEGALIST LINE AND THE CHINA'S FIRST PHARMACOPOCIA—TANG «HSIN HSIU PEN TSAO»

CHUNG ROW-YAN

(*Institute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Peking*)

公元六五九年,由唐王朝颁布了我国第一部药典——唐《新修本草》,这是我国医药史上的一件大事。这部药典比西方所称最早的纽伦堡药典要早八百八十三年,因此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药典。唐《新修本草》的出现是唐王朝前期推行法家路线促进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产物,在其产生过程中也始终存在着儒法两条路线的尖锐、复杂的斗争。

唐《新修本草》产生时期的儒法斗争情况

隋末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战争后,建立了唐王朝。唐初,由于隋末大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对农民起义的血腥镇压,土地大量荒芜,人口大量减少,全国户数不及隋时的三分之一。但是,由于隋末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战争沉重地打击了东汉到魏晋发展起来的最顽固、最反动的士族大地主集团的势力,扫除了阻碍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在唐太宗李世民当政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较进步的势力才有可能战胜和抑制腐朽、保守势力,一些代表中、小地主阶级的政治人物才有可能登上政治舞台,李世民也才有可能推行法家路线。李世民推行法家的政治路线,鼓励生产,积极抵御北方东突厥贵族军事集团对内地的骚扰,使生产得以发展,社会比较安定,开始了唐王朝前期的统一、强盛的局面。经过二十三年的发展,全国人口由唐初的二百多万户增加到了三百多万户。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都有很大发展,医药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就。

唐太宗死后,公元六四九年唐高宗李治即位。不久,就围绕着废立皇后的问题,统治阶级内部的代表腐朽保守势力的豪门士族地主集团的代表人物和主张革新的中、小地主的代表人物展开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斗争,结果革新派取胜,公元六五五年,出身于庶族地主和商人家庭的武则天当上了皇后,登上了政治舞台,开始掌握政权。这个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女政治家一上台就积极推行法家路线,一切政事“不问诸儒”,主张任用有才能的人,尽力提拔庶族地主出身的官僚,并坚决打击了进行反抗的豪门士族地主阶级的政治势力,

有效地掌握了中央集权,使唐王朝进入了它最强盛、最繁荣的时期。武则天执政近五十年,全国人口由三百八十万户增加到六百一十五万户(《唐会要》)。

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医药学的发展,而当时所用的本草还是一百六十多年前梁陶弘景所编的《本草经集注》,由于新药的增加,并吸收了不少外来药物,这本本草已远不能适应医药迅速发展的需要,而迫切需要一部全国统一的药典。就在武则天执掌政权后的第三年(公元六五七年),由朝廷出面组织了二十几个人来编写一部新的本草,历时两年,到公元六五九年由朝廷颁行。这就是著名的唐《新修本草》。

唐《新修本草》的编写过程中,经历了武则天执政初期的尖锐、激烈的儒法斗争。参加编写这部药典的长孙无忌、许敬宗、李勣、苏敬、吕才、孔志约、于志宁等二十多人中就明显地分成两大派,矛盾的焦点集中在武则天能否掌权的问题上。

在公元六五五年这两派的斗争就已开始。唐高宗李治要废王皇后而立武则天为后,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等代表豪门士族地主集团的利益拚命反对武则天,拥举出身名门士族的王皇后。而李勣、许敬宗、孔志约等中、小地主阶级的代表则支持出身庶族的武则天。这场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守旧与革新两派的斗争,也是中、小地主阶级争取政治经济的统治地位的斗争,也是儒法两条政治路线、两种政治思想的斗争。武则天掌权以后,黜逐了褚遂良等人,坚决打击了腐朽、保守势力,积极推行法家路线。唐《新修本草》编著中的两派斗争更加激烈,长孙无忌等人阴谋活动,极力反对武则天,李勣、许敬宗等则努力帮助武则天掌握政权。唐《新修本草》书成后,长孙无忌、于志宁等因反对武则天的阴谋已被揭露,遭到了武则天的打击(《旧唐书·于志宁传》)。把长孙无忌一派官员二十余人罢了官,并把长孙无忌和于志宁的名字从唐《新修本草》上划去,改由李勣等领衔。

过去史书上在大骂武则天的同时,为长孙无忌、于志宁的名字未能写在唐《新修本草》上鸣不平,说是由于“许敬宗推鞠长孙无忌诏狱,因诬构(于)志宁党附无忌”等。《新唐书》还把许敬宗列在《奸臣传》下,攻击他“阴连后(武后)谋”,“威宠炽灼”(《新唐书·许敬宗传》)。实际上许敬宗是个很有政治头脑的革新派,他在立武则天为后,帮助她掌握政权等重大问题上是有功的。公元六五九年唐《新修本草》书成后,许敬宗又和吕才、孔志约等为武则天新修全国《姓氏录》(《新唐书·高俭传》),为中、小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争取权力,打击豪门士族的政治特权,这在当时是一件很有进步意义的事情,是武则天推行法家政治路线所采取的一个强有力的措施。

法家思想对唐《新修本草》编写的影响

唐《新修本草》是在主张革新反对复古的法家思想影响下编写的,它继承了前入本草的优点,但不受古人的束缚,尖锐地指出了古代本草存在的问题,并广泛吸收了劳动人民发明创造的成果。

唐《新修本草》的序言中追述了古代本草发展的历史,指出了这些本草的巨大成就,同时明确指出秦始皇焚书时并没有焚本草(“秦政煨燔,兹经不预”),而且书中还在第一卷引用了陶弘景的序言说:“秦皇所焚,医方卜素不预,故犹得全录。而遭汉献迁徙,晋怀奔迸,文籍焚糜,千不遗一”。就是说医药书籍是由秦始皇保存下来,一点也没有损失,而只是到了东汉、西晋时才由于战争而散佚了,以致于千不遗一。这段话是符合历史的。在医药书

籍中能够勇敢地指出历史的本来面貌为秦始皇焚书争辩,这是很可贵的精神。

唐《新修本草》重视前人本草的优点,但坚决反对复古,提出了“本经虽阙,有验必录,别录虽存,无稽必正”的观点,这是很正确的,这和“泥守古经”、“抱残守阙”的儒家思想完全对立。唐《新修本草》尖锐地指出了古代本草存在的问题。如“谬梁米之黄白,混荆子之牡蔓”,“松锡莫辨、橙柚不分”等等,提出了要“考其同异,择其去取”。这是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观点。应该指出这种思想和编著中苏敬、吕才等几个重视实践,主张革新的医药学家有关。如吕才就是一个受法家思想影响的杰出的唯物主义者。从以前吕才为唐太宗修撰的《阴阳书》中可以看出他坚决反对宿命论,反对迷信,以历史进化论来反对儒家思想的历史循环论,认为文化是人所创造的,社会是不断进化的。这种历史进化论和唯物主义的观点在当时来讲是很进步的,这种思想在编唐《新修本草》时必然会反映出来。

从梁朝的《本草经集注》到唐代已有一百六十多年,劳动人民在实践中大大丰富了医药学的知识,大量的新药在实践中不断被发现并用于治疗疾病,这些丰富的经验需要加以总结。特别是唐朝此时统一了中国大部分地区,东西南北药物的交流以及外来药物的输入更是集中了劳动人民实践经验的成果。唐《新修本草》比较重视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提出了“下询众议”、“定群言之得失”的观点。在品种收集上还采取了“普颁天下,营求药物,羽毛鳞介,无远不臻,根茎花实,有名咸萃”的方法。这样就能广泛地收集行之有效的各种药物。因此全书是一部五十四卷的巨著,共收实用药物八百四十四种,其中首次增添的新药物就有一百一十四种之多。在编纂体裁上,为了便于采药和用药时辨认的准确性,重视药品实物的观察和研究,除传统用文字记述的“本草”外,还首创用药物图说的方式,详细编绘“药图”和“药经”,后者占全书近三分之二的篇幅。编书时所收集的标本,采用向全国各郡县征求当地所产药物标本的方法,并要求和实物对照,描述和精绘药图(“征天下郡县所出药物,并书图之”),做到名实相符后,再集中一起进行修纂。这种科学的编纂“本草”的方法,唐朝之后是一直沿用的。

在药物分类方面,分析了前本草分类上所存在的“草木同品,虫兽共条,披览既难,图绘非易”的缺点,选用了药物自然来源的分类方法。这种方法亦成为后世本草对药物分类的传统方法之一。

在药物的功效和应用方面,是以“详采秘要,博综方术”的原则,即占有和综合丰富的临床经验,进行分析研究后提出其重要部分,再加以收载。书中新增的不少药物,如郁金、鹤虱、蓖麻子、薄荷、茶叶等均为现代中医临床效用确切的药物。此外唐《新修本草》还收集了二十多种外来药物,如安息香、阿魏、龙脑香、胡椒等,经试验有效后,正式列入本草,使这些外来药迅速成为祖国医药学的组成部分。除生药外,唐《新修本草》还收集了一些制品,如密陀僧、硃砂、砂糖等。再如牙科用的银膏,是一种用白锡、银薄和水银合成的制品,用以补缀牙齿,这种方法西方直到19世纪初叶才开始应用。

因此,唐《新修本草》能够在理论方面或在实际应用方面,都较唐以前的本草有较大的进步,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科学价值,是和当时所推行的法家路线的反对守旧,主张革新,重视实践的思想影响紧密相联系的。

必须指出,由于作者的阶级局限性,唐《新修本草》中还掺杂着一些封建迷信的内容,收入了一些“长生不老”的药物。这些缺点在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有些已加以纠正。

从唐《新修本草》编成后的情况看儒法斗争

唐《新修本草》成书于公元六五九年,当时唐王朝规定为医学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不久就流传全国。敦煌石窟中发现的手抄卷是乾封二年(公元六六七年)时抄写的,这说明在唐《新修本草》编成后不久,就已传布到我国的西北边疆了。这也说明武则天时期我国医药学的全国交流是很普遍的。唐《新修本草》的编成对当时统一药物质量,提高医药学水平,保障人民健康,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到《蜀本草》刊行前,这部药典沿用了三百年之久。

同时,唐《新修本草》在唐代和各国文化广泛交流的情况下,得以流传到国外,对世界特别是亚洲医药学上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如在日本就发现了早在公元七三一年抄写的唐《新修本草》的长卷。据新、旧《唐书》记载,长安元年(公元七〇一年)日本文武天皇派代表朝臣栗田来中国,此人好学能做文章,武则天曾设宴招待了他。之后,栗田又到中国一次,中日文化交流日益发展。唐《新修本草》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传入日本。公元七八七年日本政府还批准把唐《新修本草》作为课本来读,之后还规定为医学学生的必修课程,“凡读医经者”“新修本草三百一十日”。

唐《新修本草》到宋朝嘉佑年间已经散佚了。但是一八九九年在我国甘肃敦煌的石窟中发现了六六七年至六六九年抄写的唐《新修本草》的长卷。这个珍贵的文献和其它大批文献史料的发现,本是一批重要的文化财富。但是当时以慈禧为头子的清王朝统治阶级是一批卖国求荣投靠帝国主义的奴才。他们尊儒反法、崇洋卖国,叫嚷“宁赠友邦,勿予家奴”。于是这份珍贵的文献在一九〇七年由英帝国主义分子斯坦因,一九〇八年由法帝国主义分子伯希和分别盗窃到了英国和法国。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药典的仅存本就在这批大儒们的出卖下,成了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和法国巴黎图书馆的收藏品了。

国民党统治时期,蒋介石卖国求荣,充当帝国主义的奴才,跟在他们洋主子的后面推行所谓“全盘西化”,歧视、排斥、打击、消灭中医药。唐《新修本草》也在他们排斥之列。一九三〇年蒋介石政府颁布的《中华药典》竟然在序言中公开说药典的老祖宗是一五四二年出版的纽伦堡药典(“缅甸首制,实始牛伦”),真是一副十足的奴才嘴脸。

全国解放之后,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卫生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医药学飞速发展。一九五三年、一九六三年两次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在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推动下,我国已组织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新编一部药典,这部反映我国药学发展最新水平的药典即将出版。这是批林批孔运动推动科学技术和医药卫生事业迅速发展的成果之一。

叛徒、卖国贼林彪这个孔老二的信徒,尊儒反法、投降卖国,在对待中国医药学方面,也是崇洋媚外、颂古非今,表现了十足洋奴的丑恶嘴脸。

回顾唐《新修本草》编写的前后过程,可以看出,即使是一本药书的编著过程也始终存在着儒法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儒法斗争的确对我国医药学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总结这一段儒法斗争的经验,可以使我們更深刻地理解卫生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深入研究儒法斗争对我国医药学的影响,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搞好中西医结合,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从而更好地为我国和世界人民服务。